

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 是辩证统一的

11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卫兴华”的文章,提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

文章称:当前中央强调和重视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是把民生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要求更加重视分好蛋糕。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只重分好蛋糕而轻做大蛋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中,生产起决定作用。就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来讲,生产什么才能分配什么,生产多少才能分配多少。而且,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决定按照什么方式、什么原则去分蛋糕。这就是说,首先要做蛋糕,才谈得上分蛋糕;蛋糕做得越大,人们分得的蛋糕才能越大。马克思主义又认为,分配对生产有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决定作用。蛋糕分得公平合理,可以调动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经济发展,把蛋糕做得更大更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也能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

起来,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分好蛋糕的同时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但国际国内发展实践表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不是天然统一的:既不是只要把蛋糕做大,收入差距就会自动缩小;也不是收入差距扩大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趋于缩小。如果没有政府的自觉调控,收入差距是不可能自动缩小的。即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看,也不存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天然统一的情况。

什么叫分好蛋糕?怎么分好蛋糕?第一,分好蛋糕不是搞平均主义、人人分得相等的一块,而应根据各自在做蛋糕中的贡献分得相应的一块;第二,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不要差距,合理的、与贡献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第三,在公有制经济中分好蛋糕,就要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优罚懒、奖优罚劣,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适时增加职工收入,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第四,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分好蛋糕,就要确保

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处理好企业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关系;第五,从总的框架来讲,要把蛋糕切分为三大块——企业一块、职工(劳动报酬)一块、国家一块,现在的问题是职工的一块偏小,所以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提高劳动报酬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只重行政命令,而应根据不同经济成分、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状况,提出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并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第七,分好蛋糕重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对低收入者来说应重在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知识水平、专业水平和劳动绩效来增加收入,不能仅仅在不变的劳动绩效和已有的蛋糕存量上不断增大自己的一块;第八,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语录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致力于尽快把蛋糕做大;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卫兴华

对话

吴祥钧:取缔非法收入 惠双民:做蛋糕就是在分蛋糕



惠双民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



吴祥钧

江苏省委党校经济系教授

现代快报:应该怎样看“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何为基础?

吴祥钧:从理论上讲,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完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观点来分析的。内容比较系统,重点也比较突出。也指出了当前分配中的主要问题。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做大蛋糕是基础,更要分好蛋糕。

惠双民:人们常说的分蛋糕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社会学上来说,民间慈善也是分蛋糕,是把“我”的蛋糕拿出来给别人。而人们富裕之后,应该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帮助,要体现社会公平,还要体现相互的同情心。可以说分蛋糕的过程是良心的体现。我觉得,做蛋糕就是在分蛋糕。做蛋糕,是民众在做蛋糕,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蛋糕,如果分不到利益,就不

会做这个蛋糕。比如说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就没有人做蛋糕,就是因为没有利益。今天是市场经济时代,谁做蛋糕谁就能分到利益。是因为能分蛋糕才去做蛋糕,这是一个市场机制的问题。分蛋糕是作为人类社会公平、有良知地体现再分配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说,做蛋糕和分蛋糕不存在冲突问题。

现代快报:做蛋糕、分蛋糕都和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需要把握好什么样的原则?

惠双民:必须保证做蛋糕过程中公平、自由的竞争,合法的经营,这样才能保证既做好蛋糕,同时也能分得合理、公平。

现代快报:在今天这样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下,百姓特别关注财富的分配公平,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吴祥钧: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就是非法收入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做蛋糕和分蛋糕都是“正常的蛋糕”。此外,还有一种问题造成收入差别很大,其中有一块是非法所得,比如说贪污腐败、走私所得的收入。这方面的数字没有统计,但恐怕不是很小的。还有一块就是非常离奇的收入,比如一些明星的收入。还是要贯彻中央精神,去取缔非法收入、限制过高收入,要多做这方面的文章。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被惯坏的GUCCI和被严惩的沃尔玛

自称曾在深圳GUCCI(古驰)旗舰店工作过的员工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控诉古驰公司100多项行为规定中限制员工:喝水要申请、上厕所要报告、孕妇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等,甚至怀孕7个月的员工仍要上夜班,最终致使孕妇流产。

(10月11日《新消息报》)

原来让无数“奔奔族”为之癫狂的光鲜亮丽的大牌包包背后,上演着这样的“步步惊心”。难怪网友“海上微尘”会说:“奢侈品的背后是多少血泪堆砌的!”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位曾到国外培训的古驰员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些问题在古驰国外工厂根本不存在。公开信中说:“古驰也许是一袭华

美的袍子,但是却长满了虱子。”为何同样是那袭袍子,在国外是华美与温暖,而到了国内,却爬满了嗜人的虱子?网友“一只愤怒的小鸟”就表示,其实“血汗工厂”何止这一家,在中国很多外资企业都存在类似的压榨员工的现象。确实如此,再想想沃尔玛的“绿色猪肉”,为何这些在国外都规规矩矩的大牌到了中国,就“沦陷”?难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水土不服使然?

从相关部门的推诿中可以找到答案。深圳罗湖区人力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相关法律仍存漏洞,因为GUCCI在上海注册,其在深圳的店铺相当于“在深圳的柜台”,他们难以获得相

关信息,所以处理起来很为难。真是这样吗?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既然GUCCI在深圳当地落地生根,使用当地的工人,不管是店铺还是什么,自然就要接受当地相关部门的监管。正是监管睡觉,或者装糊涂,“血汗工厂”才会如此大胆与嚣张。

有章不循、有法不依,这背后的猫腻需要认真厘清。恐怕不是因为国际大牌的名头吓缩了手脚那么简单,而是这背后有着错综的利益纠缠,是“为了经济

发展不惜牺牲环境乃至普通劳动者权益”的错误发展观,当然,还有着“呵护”国际大牌带来的GDP政绩使然。

还是看看重庆怎么对待不守法的国际巨头吧。

因“假冒绿色猪肉”事件,继重庆沃尔玛7家分店于10月9日停业整顿后,10月10日晚,沃尔玛在重庆另外6家分店也一并停业整顿,至此,重庆所有的沃尔玛全部停业。此外,当地警方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拘捕了25名涉案人员,两人被逮捕。

看看,违法必究,对国际巨头也毫不客气,这才是根治巨头们藐视消费者和法律的办。 (刘艳)

热点纵论

1700万的“破船”是观赏式政绩的产物

有网友爆料称,10月10日,兰州“酒钢号”豪华游船在黄河岸边试水时倾覆。据了解,“酒钢号”游船是兰州市重点项目,总投资1700多万元,建成后将是兰州市最大、最豪华的游船。该市交通局称,游船倾覆原因主要是施工单位操作失误,错误估计了水位。(10月11日《南方日报》)

一艘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游船,却在下水当日就沉船,真是天大的笑话。即便兰州市交通局言之凿凿地表示沉船是施工单位的失误,然而,对于一项投资上千万的公共工程,在沉船之前,相应职能部门最基本的监督职责又体现在哪里——较之施工单位“可能存在”的失误,当地

相关部门的事后推诿无疑是另一种“烂尾”。

公共工程的烂尾现象早已经屡见不鲜,甚至兰州市交通局事后的推诿姿态也可以想见。然而,以“游船”形式出现的烂尾工程,还是有其关注价值。在我看来,“酒钢号”豪华游船其实并非沉于施工单位的失误,甚至也无关于监管者的一路失声,而是某种观赏式政绩的必然结果。

很简单的事实是:并不富有的兰州为何要将1700多万元资金投入一艘游船?该项目既是兰州市列重点项目,又是由该市交通局负责游船,这种“过于偏爱”的投资目的,其实已经不难判断:豪华游船足以成为当地领导

耀眼政绩中的一笔。

因为需要被看见,所以要投资游船;因为只是为了被看见,所以游船的命运就可以被想象了。在这种观赏式政绩观的指挥下,游船的需要与否当然就无须论证了,游船的质量往往也会被忽略,观赏式政绩在沉船事件中再次展现出它的如影随形。

任何虚妄的观赏式政绩都是值得警惕的:现代政治学早已经表明,政绩不能只围绕公权部门的意图运转,必须从制度上凸显社会各界对行政行为的考核力量,行政行为才能受到约束。一艘投资1700多万元豪华游船的意外沉船,既说明了观赏式政绩的根深蒂固,更表现出它本身

对社会监督习惯性的排斥:在这样一项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公共工程中,我们竟然没有发现民意与外界监督的“在场方式”,如此之下,官员打造观赏式政绩的欲望就只会日益膨胀。

“烂尾游船”正在重复观赏式政绩的悲剧,相比于那些烂尾高速、烂尾大桥以及人造景观,它只是因为多了“下水当日即沉船”的新闻点而被人关注。正因如此,烂尾游船看似是一起闹剧,道出的却依旧是那些被重复问过的问题:如何使公共投资更“必要”?如何塑造官员正确的政绩观?如何增加民意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力?

(王聘)

公民发言

乔布斯是“培养”出来的吗?

正在大家热议谁将成为下一个乔布斯时,宁波出台了一份关于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培养的《意见》。其中提到,从今年开始,宁波市将以5年为一个培养周期,在3个层次培养1400名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

(中新社10月11日)

按照宁波的计划,千余名“乔布斯”领军式人物将在5年后被批量打造出来。而从超过5000万元的培养经费,以及邀请两院院士来做导师的计划来看,宁波相当舍得投入,甚至堪称大手笔。

原创不容易,山寨却简单得多。不过,山寨一个产品容易,但想用同样的方式批量制造“乔布斯”,宁波有关部门恐怕很难如愿以偿。宁波这种自上而下的培养模式,看似体现出对营造创新环境的重视,但实则却依然是一种行政式的套路,而这种行政化的人才培养体制,恰恰与创新的本质与初衷相悖。

不难看出,无论是千名“乔布斯”候选人将从全市企事业单位中选拔,还是通过行政之力直接参与到“乔布斯”式人才的培养和打造,骨子里仍然是行政主导性“创新”。乔布斯之所以能够写就传奇,在于他一直身处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中,在于政府对创新的鼓励和激励,有了这种环境而非政府主导的培训,乔布斯才能生长起来。要鼓励创新,需要政府培育创新土壤,而非直接培训创新人才。

当创新人才依然步入行政化培养的老路时,与其说是对创新的激励,毋宁说是对创新环境的破坏,与创新本意的背道而驰。真正意义上对创新的呵护,其实更应是对多元化个体的包容,对草根式生长的呵护,而不是以权力替代市场进行资源分配,甚或以行政化的眼光来对“谁是下一个乔布斯”作出自信满满的指点。那种花钱便能打造出“乔布斯”的想法,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权力自大罢了。

(吴江)